

對汪榮祖先生〈追尋半世紀的蹤跡〉的回應

王晴佳*

中正大學講座教授汪榮祖先生以〈追尋半世紀的蹤跡〉為題（刊於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 40 期），對拙作《台灣史學 50 年，1950-2000：傳承、方法、趨向》作了較長的評論。以下是我簡短的回應。首先我想感謝汪先生以史學界前輩的身份，在繁忙的教學和研究之餘，撥冗閱讀拙作，並寫作長文指教，使後學的我感到十分榮幸。我與汪先生並非素昧平生，對我而言，認識汪先生有近二十年之久。記得在當學生的 1980 年代，汪先生曾在上海擔任訪問教授，我就聆聽過汪先生的演講。那時大陸開放不久，像汪先生這樣學有所成的「美籍華人教授」並不多見，我那時在擁擠的講堂裡，瞻仰汪先生的風采，真是萬分仰慕。之後我在美國學習期間，也記得曾向汪先生寫信求教，承蒙汪先生不吝回函指教，至今仍然記得信中的一些內容。最近幾年，在美國、台灣和其他地方，都有機會與汪先生晤面，對汪先生的尊敬，可說是有增無減。

也許是以上的關係，我對是否回應汪先生的評論，躊躇良久。其中原因，不外有二：一是汪先生的評論，似乎以「否定一切」為目的，如果借用我曾十分熟悉的「文革」語言形容，那就是「批判一切，打倒一切」。對於這樣的評論，回應起來就不免意氣用事，以致無法真正討論問題，達到求教的目的。我雖然從事史學研究沒有如汪先生這樣長久，但還是懂得作為史家的基本

* 美國 Rowan 大學歷史系教授

本態度，那就是要心平氣和，實事求是，不能偏激、偏袒（我在以下的回應中，將儘量做到不偏袒自己）。二是汪先生雖然評論較長，但似乎沒有討論什麼實質性的問題，只是對拙作的一些用詞和術語，提出商榷。還有一些是有關歷史評價的問題，譬如汪先生責我對近史所的「現代化區域研究計畫」評價過高。對我來說，這些看法大可以見仁見智，糾纏起來並無多大意思。

但我還是寫了這個回應，其中原因也有兩個：一是汪先生指出，拙作的寫成主要靠的是一些訪談。這自然是不確實的，因為我自己雖然沒有列一參考書目，但大陸的一位讀者已經為我統計過，拙作參考的各種論著和史料文獻，約有一百多種。但既然汪先生說我靠的是訪談，隱含拙作的一些疏漏，那些被我訪談的人士也有責任，至少那些幫助和建議我聯絡訪談人士的學者，有一種脫不了的干係。為此緣故，我也就應該做一辯白了。因為我雖然不才，但不想因為拙作的緣故，而連累他人的聲譽。二是拙作雖已出版，但本人對台灣史學的研究，仍在繼續之中，今後寫成英文著作。¹我想藉此回應的機會，既向汪先生和其他讀者方家請教，又想乘機披露自己最近研究的心得和發現。在此對近史所《集刊》的編輯委員會能刊登汪先生的評論和我這篇回應，表示我的謝意。

其實現在回想起來，在我訪談、請教過的人士中，也包括汪先生。但不知為什麼，我竟然在〈前言〉中，忘記感謝汪先生了，對此特表歉意。讀了汪先生的評論，才使我慢慢想起那次閒談中請教的內容了。汪先生在評論中，批評我未能把國民黨「白色恐怖」對知識界的鎮壓，以及知識界那時如何靠攏政府的情形，加以詳述。記得那時在閒談中，汪先生曾把他所尊敬的李敖先生的事跡，對我做過描述。但李敖先生雖然曾修習過史學，但其志博大，並不會棲身於區區史學界，因此我在書中沒有提李敖。汪先生志趣廣泛，最近幾年又對錢鍾書的學問，頗多研究，並仿照錢先生的文體，寫就《史傳通

¹ 我已經寫成一篇英文論文，可見 Q. Edward Wang, "Taiwan's Search for National History: A Trend in Historiography," *East Asian History*, 24 (Dec. 2002), pp. 93-116。

說》等論著，儼然把錢鍾書視為當代一史學大師。²但我不知從未涉足史壇的錢先生，在九泉之下對汪先生的提拔，會有何感想。

在那次閒談中，汪先生也提到何炳棣先生對台灣史壇的影響；他在評論中，說我不提何先生，是「漏了一條大魚」。但他同時也承認，何先生的主要著作，從來沒有中文譯本，而何先生由於眾所週知的原因，並不喜歡在台灣各大學演講。何先生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，自然不容懷疑（其實拙作在頁 65 的註 48 中，提到何先生在中國社會史、經濟史等方面的重要貢獻），但就對台灣史界的影響而言，顯然不及其他華裔學者。就管見所及，台灣學者的論著中，也很少提到何炳棣先生對他們研究的影響。要說遺漏的話，拙作或許應對黃仁宇先生多一些交代，因為他的著作，在台灣比較暢銷，自然有一定的影響。但由於黃先生著作的影響，以最近二十年內為最顯著，而拙作的下編，以敘述台灣史的興起為主，視此為台灣史學研究的主要趨向，因此沒有篇幅顧及。

汪先生的評論的確對拙作的涵蓋層面批評較多，認為我一方面不想做「總體評述」，另一方面又想指出台灣史學「發展的淵源、變化之原因和未來之趨向」。但他的批評似乎脫離了「語境」（out of context；中文裡的「斷章取義」，言太重，此處不用），因為如果讀者從拙作的〈前言〉讀起，便可明瞭，我所謂不做「總體評述」，指的是不想像其他史學史的著作那樣，由專家就專題做回顧總結（如周佳榮所編的《當代香港史學》那樣），因為個人學力確實不逮。而所謂討論台灣史學的「淵源」、「原因」和「趨向」，其實也有限定的範圍，那就是以歷史意識、歷史觀念的變遷為考察的基本對象。

我之所以說汪先生的評論並未指出什麼實質性的問題，是因為他並不認為我將台灣史學的演變以三個時期劃分，有什麼不對（當然這一劃分，並非完全是我個人的見解，我已在書中指出他人相關的論文）。但他指出，既然有三個時期，為何又「厚今薄古」，而不在篇幅上來個平分秋色？我的回答

² 有關汪先生與錢鍾書的來往，可見氏著，《史學九章》（台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02）。

首先是，這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，屬於個人興趣的範圍。除非此一作法，有什麼根本的大錯，但汪先生又沒有明言。再者，史家寫史，厚今薄古，古今中外皆然。司馬遷的《史記》，雖然上溯三代，但仍以秦漢時期為主。古希臘希羅多德的《歷史》，視野寬廣，但還是以當時的希臘、波斯戰爭為重。我在此處並無意將拙作與這些史學名作相比，只是想指出，史書寫作厚今薄古，由來已久，因此無可厚非。

汪先生對我將戰後至 1960 年代中期的台灣史學，視為「初創時期」，頗為不滿，認為台灣史學自有其長久的淵源。這一點其實我也同意，並在拙作的上編做了鋪陳。但應該看到的是，雖然台灣史學的衍生與民國時期的史學有著重要的聯繫，但台灣在當時畢竟是日本的殖民地，那些民國時期的重要史家，都要到戰後才陸續抵台，如果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台灣史學也視為民國史學的一支，很難服人。同樣，雖然日本在台北建立了帝國大學，但就我所知，其歷史系的師生均以日本人為主，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前，台灣人在台北帝國大學取得歷史學位的，只有兩人；如果說在那時已經有台灣史學，也不能服人。從台灣歷史教育的建立和歷史研究與教學的人才培養來看，都是在戰後，特別是 1950 年以後才開始的，其中出力的自然有留學日本的學者。但由於國民黨政府的遷台，還是以那些從大陸來的史家為主導力量。由此看來，稱那時到 1960 年代中期為台灣史學的「初創時期」，並無大錯。因為正是在那段時期，歷史教育才慢慢向台灣的居民開放，一些優秀的人才也慢慢進入了台灣歷史研究的學術機構。

汪先生雖然對拙作的分期沒有太大的不滿，但卻對我所謂「科學史學的轉折」，表示出強烈的意見。指出既然科學史學的傳統已經由源自大陸的「史料學派」建立，怎麼會在 1960 年代出現「轉折」？這一批評，讓我十分不解。就我看來，正因為科學史學的傳統得以建立，才會在以後出現轉折。如果沒有建立，那麼何來轉折？各派之間不就還要繼續為爭「正統」而努力嗎？這裡的關鍵問題，我認為出在汪先生對「科學史學」的定義，有一種狹窄和單

一的理解，似乎認為「科學史學」只有一種，只有一類。但其實據我的研究，科學史學在近代西方興起以後，經歷了多次的轉變（見拙作頁9以降）。如果說在十九世紀，史家企圖吸收生物學、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，將歷史研究科學化（孔德、達爾文、斯賓塞和馬克思的影響，便是顯例），那麼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，史學的科學化又傾向與經濟學、人口學等學科結合；而從二十世紀的下半葉開始，史學又與人類學、民族學等結合，直到最近的二十年，由於後現代主義的影響，史學才有所脫離科學化的軌道，與文學和語言學等並行。換言之，史學的科學化是近、現代史學發展的主線，但其中的曲折變化也歷歷在目，並反映在台灣的歷史研究中。當然，就台灣史學研究的現狀而言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仍然不怎麼顯著。³但無論如何，台灣史學的科學化，或者說中文世界史學研究的科學化，仍然在繼續發展，而且呈現出各種特色（中文史學界對後現代主義的冷淡、甚至抵制，也許便是特色之一）。

如果看到這一點，那麼對拙作所謂科學史學的轉折，當有不同的理解。此處我無意重複拙作已經寫過的章節，只是想簡單交代一些我的想法。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，以傅斯年為主的「史料學派」，挾政權之強勢，在台灣史界建立了「正統」的地位。但隨著新一代台灣學者的崛起，這一正統受到了挑戰，而這一挑戰的結果，正是結合了經濟學、人口學的社會史之興起。不過，這一挑戰雖然擴展了史學研究的範圍，但並沒有徹底撼動「史料學派」在台灣史壇所建立的基礎，因此成就不是那麼盡如人意（許倬雲先生在為拙作寫的序中說，他雖然在那時主編《思與言》，但並未想真正挑戰傅斯年先生，可見「史料學派」所建立的傳統，也許在一些程度上符合了歷史研究的規範，因此仍有其生命力）。汪先生在評論中，以沈剛伯先生為例，指出那時史學界風氣之轉變，與拙作的結論大同小異。其實，我自然不會如此無知，認為「史料學派」所代表的科學史學，就能超脫時空，完全客觀，不受政治的影

³ 參見盧建榮，〈台灣史學界的後現代狀況〉，《漢學研究通訊》，卷21期1(2002)，頁6-10。又，王晴佳、古偉瀛，《後現代與歷史學：中西比較》（台北：巨流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281-364。

響和擺佈。我在拙作的上編，將胡適、傅斯年等人的科學史學，歸為民族主義史學的一種，便已經證明他們史學的政治性。有關民族主義史學的論著，在國際學界可謂汗牛充棟，民族主義史學的政治關懷已經近乎常識，何必多費筆墨？⁴

但汪先生則一口認定我的無知。他提到我在評價杜正勝的「同心圓理論」時，「驚為『首創』」。我的確用了「首創」這兩個字，但僅僅指該術語的使用，因為我在同一句話裡，便寫道「就其實踐的層面觀之，則並非聞所未聞」（頁 220）。汪先生的這一「驚」字，就無從著落了，因為顯然我並沒有對「同心圓理論」的思想性，感到有什麼新穎之處。但要感謝汪先生的是，為了寫這一回應，我順便可將自己最近的發現提供給讀者。因為從事研究日本近代歷史教育的緣故，我在偶然之間發現，這「同心圓」一詞，或「同心圓的擴大主義」，原為日本歷史學者首先使用，用來概括近代日本歷史教育的實踐；其含義與杜正勝先生也幾乎一樣，即要在歷史教育中，貫徹從本國史（日文「自國史」）到亞洲史和世界史的層層擴大。不過這一「同心圓」的理論，在戰後受到了批判。⁵當然，我們沒有證據說杜先生之使用「同心圓」一詞，一定受到了日本學者的啟發，因為他本人並沒有如此交代過。但至少我應該在以後改口，在術語的使用上也不能視其為「首創」。

在結束我的回應以前，還想就此機會做一點自我批評。首先，因為拙作成書倉促，只是想就台灣史學演變的犖犖大者，做一概述，因此對有些重要而優秀的史學成果未能涉及，深感遺憾。如台灣學界在中國史研究方面既有傳統，又有新作，但由於拙作下編特重分析台灣史的興盛（儘管我仍然認為這是一個主軸），因此對於中國史方面的研究多有疏漏。但我也沒有像汪先

⁴ 有興趣的讀者，可參見 Prasenjit Duara, *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* (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95) 和 Q. Edward Wang, *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* (Albany, NY: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, 2001)。汪榮祖編，《五四研究論文集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79）的有些章節，亦可參考。

⁵ 見比較史、比較歷史教育研究會編，《自國史と世界史：歷史教育の國際化をもとめて》（東京：未來社，1991），頁 53 以降。

生所說的那樣疏忽，竟然把近史所的「現代化區域研究計畫」，只放在下編中提及。如果仔細看的話，我在中編裡面對此有多處提及，並把它視為「內地化」和「土著化」爭論的前奏。

其次，我對台灣近年婦女史、性別史的發達沒有詳述。其實，就台灣史學的發展趨向而言，這一流派的興起和變化，非常值得注意。因為這些研究都震撼了近代的史學觀念，為歷史研究的發展探出了一條新路。我將在今後的研究中，加以擴大補充。

記得有人說過，寫書評的人大凡有兩種目的：一種是為了與作者討論學問，另一種則是為了展現自己的學問。這兩者的區別是，前一種在寫作時，會同時「給予和獲得」(give and take)，而後一種則只是「給予」。汪先生為拙作寫的書評，純以教訓、批評為主，因此多是給予，對此我受之有愧。從汪先生一貫的作風來看，每次參與學術爭論，都會引出自己的論著，用一句已經用俗了的套話：「拋磚引玉」。我衷心希望拙作和我們這次學術交流，能引發汪先生對台灣史學研究的興趣。如果真是這樣，則將是學界之大幸，也是筆者的深切期望。